

科大卫、刘陶陶主编：《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身份与透视》

吴涛

(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东省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A

科大卫 (David Faure) 和刘陶陶 (Tao Tao Liu) 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身份与透视》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如何通过城镇或乡村这样的标记来突出自己的特征。这本书乃是海内外 10 位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晶，文章均为以“中国历史上的身份”为主题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此前第一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出版了名噪一时的论文集《统一与分化：中国的地方文化和身份》。¹

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身份与透视》出版以前，牟复礼 (F. W. Mote) 和罗威廉 (William Rowe) 等西方学者分别通过作为行政中心的都市和商业中心的市镇的个案研究，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慎重。牟复礼在 1970 年代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换言之，明代既没有出现城市财富独占式的集中，也没有显现出城市建筑的独特性；实际情况是苏州城墙以内具有乡村生活的一面，正如都市生活的侧面与郊区的农村差别不明显。牟复礼没有否认某些城市的行政中心地位，但他指出都市生活并不受前者的制约。²罗威廉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像汉口一样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县城不一定是商业中心，市镇也不一定是行政治所。然而，牟复礼和罗威廉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³科大卫和刘陶陶主编的《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企图突破以往学者或过于注意市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打算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一座理论桥梁。

在导言部分，编者将城乡分别对中国历史上身份认同的影响作了大致的时代划分。在明清时期，城乡分别不是个人身份的明显标记，直至 20 世纪早期，区分城乡的地方自治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因，导致将农村视为落后之源的观念开始萌动。1920 至 1930 年代，农村落后观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1949 年以后实施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它将社会划分为刻板的阶层，并把不同的人群贴上“工人”或“农民”的标签。

第一章至第四章重点讨论了明清两代的城镇与乡村。戴瑞·伯格 (Daria Berg) 通过考察晚明小说《醒世姻缘传》中所描述的 17 世纪的中国城市，认为传统士人向往的“田园乌托邦”是根本不存在的，它随着乡居者的入仕而名存实亡。不真实的乡村生活制造出城乡连续的假象。在晚明文人的眼里，商业社会侵蚀了传统的社会等级，逃遁世俗，追求美丽的自然风光，成为他们找寻社会和谐和权宜之计。

赵世瑜从庙会这种既存在于城市又存在于乡村的活动着眼，探讨明清以来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城市与乡村的。他认为，尽管中国的城乡关系与西方存在区别，但城市和乡村对各自的界限还是有所区分的，它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崇祀对象，并通过各自的庙会来整合自己的社区。这种城乡差异实质上是等级关系的表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隐喻着乡村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正是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本质上一致的文化，不同的仅仅是行政区划上的支配关系，城乡区别才更多地体现在社区界限的意义上。

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试图将华南的“佛山模式”⁴推广到江南。他认为，士绅在市镇里比在繁荣的商业城市更容易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在南京和苏州这样的特大城市中，尽管存在不少“望族”，但没有一个家族处于统治地位；相反，在市镇一级，权力多由一个或数个家族支配。科大卫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 (rise of the lineage) 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至 16 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暴发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在士绅们的理念里，商业一直被加以抑制，

城乡一体的文化传统得到更广泛地支持，理想的行政统治可以从帝王下达到普通农民；他们通过采用国家话语，将地方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将商业中心纳入以征收为主的行政管理制度中并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不仅村民即便是城镇居民也不能视而不见城镇相对于农村的优越地位。

亨利塔·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以近年来在学术界引起过广泛关注的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主要材料，从一个居住在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眼中透视清末民初的城乡关系。刘大鹏身处一个城乡平衡剧烈变动的时代，传统的城乡关系行政理念被一种全新的“地方感”所取代。在县一级，这种替代并不明显：由赤桥村和其它村庄组成一个乡，在由数个乡组成一个县，而县不代表由具有严格边界的一个一个乡构成的抽象实体，仅仅象征着地方官和衙门所在的城市。在作为省会的太原，尽管权力和各级官员在那里汇聚，西式建筑和经济技术也慢慢影响着居住在太原城里的市民的观念和生活，但太原周围的农村却缺乏秩序，乡民们对时局变化态度冷漠。

自 19 世纪下半叶取代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的商业中心后，上海逐渐产生出庞大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队伍，近代城乡二元分割的图像亦多以上海作为主要参照。本书的第二组五篇论文的主题主要围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城乡格局展开。伊丽莎白·科尔（Elisabeth Kol1）剖析了位于南通唐家闸村的大生纱厂的组织形式。大生纱厂从农民中招工，农民工人却没有真正融入工业文明。在纱厂工人心目中，工业文明虽然可以化约为厂规厂纪、严格的作息时间和劳动分工乃至厂门口的时钟塔楼，但大生纱厂的 8000 名工人一直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百分之五为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熟练工人，从南通以外的地方主要是上海招聘而来，居住在由厂方提供的专门的宿舍大院中。剩下的大多数人为来自附近农村的非熟练女工，她们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在她们自己的田里耕作。尽管两项工作对于她们的生计同等重要，但这些工人更愿意将纱厂里那份工作视作自己的“主业”，将种田看作“副业”。大生纱厂的创办人张謇曾在工厂专门修建了一座公园，不是一般工人和村民所能享用的，而是住在宿舍大院里的人的“专利”。唐家闸就这样笼罩在大生纱厂的阴影之下，种田被迫沦为次要的乃至落后的作业。

虽然民国初年城市的社会政治面貌发生着巨变，但卢汉超提醒我们不能高估这些变化而忽略都市中的“传统延续”。构成旧上海的不仅仅是那些我们已经习惯阅读的内容，我们更应该关注小市民和城市贫民群体的生活工作状况：繁华马路的背后是拥挤破烂的里弄，高楼大厦遮盖不了潮湿阴暗的棚户区。作为第一个引进现代卫生制度的中国城市，大多数市民无缘抽水马桶；能够方便享用各种美食的上海人，早餐却一直与开水泡饭为伍。从乡下来上海淘金的无论人力车夫还是乞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逃避乡间的贫困，这使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市民日常生活仍具有相当多的农村色彩，而与 17 世纪的苏州完全两样。

马敏关注的问题为晚清时代是否存在一个缘于西方历史经验与理论资源的“市民社会”。他利用苏州商会档案揭示了苏州商会的“官督商办”性质。商会在政府的资助下办理消防队和地方治安这样的城市公益活动，进而将所有其他民间自发组织合为一体，这些活动表现出公共领域的扩张和国家同地方士绅的合作。此前马敏和朱英曾经共同提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的概念，认为这种网络具有“潜在的地方自治政府”、“独立社会”的发展倾向。⁵无论实体化的“市民社会”在苏州是否真的存在，晚清地方自治背景下的苏州商会与传统会馆公所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剥离是不容轻易否定的，这至少显示出城镇较周围农村更出色的组织能力。马敏无意挑战传统社会城乡一体的观点，但是，他指出，清末自治按照人口划分乡和城镇，从法律上和行政上改变了城镇和农村认同的格局。“市民社会”的兴起更多地是出于城镇精英自我意识的加强。从这以意义上讲，清政府不知不觉参与了 20 世纪初的城乡转型过程。

叶凯蒂（Catherine Yeh）在翻阅了绘制于 19 世纪的各种版本的上海地图后，发现直至 1880 年代，华界和租界之间相知甚少。1817 年的中文地图标注了县衙门和城隍庙的位置，1853 年的西文地图标只注了教堂，却将县城完全剔出，黄浦江被置于上海最突出的位置。按照叶凯蒂的说法，造成上海中西社区分离的主要因素出在中国方面。1880 年代以前，中国游客到新奇的租界一直被压制，访问租界被认为是冒险行为。1884 年，《申报》的主办者英国人欧内斯特·麦吉尔（Ernest Major）绘制出《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把华界和租界放在同一张地图上。在此之前九年，中国人冯卓儒也曾绘出完整的上海商用地图，难怪叶凯蒂将上海地图的最终绘成称作“商业革命的胜利”。

刘陶陶以现代小说为素材，将研究的地域扩大到上海以外的其它沿海城市——天津、北京和广州。他强调，被沿海大都市吸引的不仅有人力车夫和乞丐，也包括以作家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后者不单单为了求职，也为了追求新文化。随着传统的上升阶梯被废除，新型知识分子在接受了昂贵的西式教育之后发现报效无门。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讲坛发表见解，严格的审查制度也禁止着他们的非份之想，他们不得不借助新闻媒体对时局施加有限的影响。鲁迅的小说有严重的城乡分割倾向，茅盾、夏衍和丁玲通过控诉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也纷纷加入到这一行列中。鸳鸯蝴蝶派小说以揭示都市文人的世俗生活著称，到了老舍，则完全抛开农村题材，专心写他的北京话小说。对于民国时期的作家为何偏爱城市，刘陶陶除了将其归结为现代化情节在起作用外，强调新式文人对自由自在的城市生活更具有精神上的归属感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1949年以后，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城乡二元格局最终成为现实。而1980年代以来小城镇的发展，则显现出传统城乡关系的某种复苏。萧凤霞（Helen Siu）以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小榄镇为例，回顾了经济改革以后当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历程。她试图通过小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的复兴不会导致“自由化”，相反，传统的文化遗产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1994年，萧凤霞亲历了一次历史悠久的小榄菊花会。按照原先菊花会的传统，拜神祭祖活动必不可少。然而，萧凤霞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人们舁神巡游的场面，庙宇、宗祠不再卷入人们的欢庆仪式中，代之以纯粹的商品交易。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一个根植于乡土的“新小榄”应运而生。

《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身份与透视》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对明清以来城乡关系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例如哈里森和科尔的研究。尽管如此，仅仅凭一本会议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作者大多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入中国社会而已”。对于具体的研究者来说，打破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的二元格局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城乡关系史研究的行列中来。

¹ Tao Tao Liu and David Faure eds,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² [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Mote, Frederick W.,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1973, 59: pp35—65.

³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⁴ David Faure, 'What made Foshan a Twon?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identities in Ming- 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990., 11: pp2:1-31.

⁵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David Faure、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Wu Tao

收稿日期：2003-05-31

作者简介：吴滔，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